

# 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从亚非团结合作到“全球南方”共同崛起

杨正权 李安山 肖 宪 陈利君

王国平 林廷明 成振海

**摘要：**1955年召开的万隆亚非会议，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这些原则成为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立场的国际关系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亚非国家的联合自强，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蓬勃斗争，开启了南南合作与不结盟运动的序幕，推动了国际秩序的深刻演变。在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的引领下，新中国外交开创了新局面，中国与中东、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关系迎来了新的转折期。与此同时，广大亚非拉国家也开始了团结合作。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亚非拉国家正在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努力改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格局，这说明时至今日，万隆会议即将迈入70周年，万隆精神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万隆会议；新中国外交；中国—中东关系；中国—东南亚关系；中国—南亚关系；全球南方

**收稿日期：**2024—12—12

**作者简介：**杨正权（1967—），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党组书记、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式现代化与区域国别研究；李安山（1955—），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史；肖宪（1954—），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东国际关系；陈利君（1967—），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南亚国际关系；王国平（1965—），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南亚东南亚研究》编辑部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国际关系；林廷明（1984—），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南亚国际关系；成振海（1991—），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现代国际关系史。

## 万隆精神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杨正权

1955年召开的万隆亚非会议，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原则”，这是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立场的极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自诞生之日起，十项原则就闪耀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万隆精神”。时至今日，万隆会议即将迈入70周年，万隆精神仍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 一、万隆会议的历史意义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齐聚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历史性会议，史称“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是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亚非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会议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共同抵制新老殖民主义对亚非国家的压迫和侵犯，讨论的问题和确立的原则、目标都事关亚非人民的切身利益，因而这次会议有着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影响。

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十项原则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这表明1954年由中国、印度和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尊重和接受，对推动国际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为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和愿望。万隆会议的召开，有力地推动了亚非国家的联合自强，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蓬勃斗争，开启了南南合作与不结盟运动的序幕，推动了国际秩序的深刻演变。会议所形成

的“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等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在战后国际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万隆会议的召开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从独立自主、反帝反殖，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亚非地区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二、万隆精神的时代价值

万隆会议及万隆精神历久弥新，不断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2005年4月22日至23日，亚非106个国家的领导人齐聚印尼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会议，纪念万隆会议召开50周年。峰会通过《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恢复1955年《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所体现的万隆精神的活力，以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方向，规划亚非之间未来的合作。2015年4月22日至23日，亚非国家领导人再次齐聚印尼首都雅加达，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以“加强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为主题，通过《2015万隆公报》《重振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等重要文件。2025年4月，万隆会议将迎来70周年大庆，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必将揭开人类历史的崭新篇章。

万隆会议以来，世界局势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塑造了这一时期国际局势的基本格局，而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力量，给冷战阴云笼罩的世界带来新的希望。亚非拉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比如亚非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给旧的国际秩序注入了新的发展元素。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上，更反映在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独立自主性和战略主动性上。在国际格局剧烈演变的过程中，区域合作的深化与规范政治的兴起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的重要特征，传统的基于实力的国际政治逐渐让位于基于规范和制度的国际协作。在某种程度上，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团结、友谊、合作、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精神，推动了国际局势朝着和平与发展的正确方向发展，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

万隆会议及其会议所形成的万隆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传承和创新，因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15年4

月召开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所指出的，“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我们要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sup>①</sup> 202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始终是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sup>②</sup> 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万隆会议，会上发表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其中就包括了这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这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立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选择。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成了“诞生于亚洲，迅速走向世界”的过程，赋予了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内的万隆精神以强烈的时代意义和普世价值。

70年前，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为万隆精神的确立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今天，当我们重新面对这个问题时，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的答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十项原则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强调的加强团结合作、增进沟通理解，正是万隆精神的核心要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万隆精神的伟大传承和发扬，必将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

<sup>①</sup> 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2015年4月22日），《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18页。

<sup>②</sup>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024年6月28日），《人民日报》，2024年6月29日，第2版。

## 万隆会议：新中国多边外交的典范<sup>①</sup>

李安山

作为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的幸存者之一，维修工程师卡尼克在其著作《克什米尔公主号》中记载了他的亲身经历：“我仍然感到飞机失事时的情景历历在目，机上的每个人在我的记忆中都栩栩如生。我仿佛见到格拉里娅面带坚毅的表情，出现在滚滚浓烟之中，手里拿着一叠救生衣，以坚定的步伐朝机舱走去；我仿佛见到杰塔机长全力以赴地掌握着方向盘，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英勇地设法保持飞机的平衡——他坚忍而冷静，开朗的面容上全无惧色，用沉着的声调发布命令；我仿佛见到顿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一大堆仪表盘，控制着飞机的发动机，在死神面前，还不折不扣地执行着机长的命令；我仿佛见到杰苏查、毕门塔和乘客们在一起，格拉里娅在给他们穿救生衣。还有那些乘客——八位中国人、一位越南人、一位波兰人和一位奥地利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普通人能以那么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死亡，就是敢死队员在战场上执行必死的任务，也难免有人会微露惧色，但是这些人却具有钢铁意志。没有一个人乱动一下，没有一张面孔流露出丝毫恐惧。他们全都正襟危坐，似乎没有注意右边的熊熊烈火和客舱里呛人肺腑的浓烟，我从来没有见过对死神如此的蔑视，也从未见过人类的勇气可以达到如此崇高的程度……这十六位忠诚的、爱好和平的人被杀害了，他们是随‘克什米尔公主号’一道被那该死的特务放在轮穴里的致命定时炸弹谋杀的。愿他们的灵魂安息吧！他们是真正的烈士，为最崇高的事业——和平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sup>②</sup>

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印度经香港飞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负责运载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飞机在接近印度尼西亚海岸时爆炸，机上除3名机员生还外，包括8名中国人的11名乘客及5名机组人员罹难。由于周恩来总理于4月初接到缅甸总理关于4月15日前先访问缅甸的邀请，未走此路线，由

<sup>①</sup> 本文系201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不结盟运动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与研究(1961—2021)”(项目编号:18ZDA205)的阶段成果。感谢王颖和责任编辑李丽在本文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sup>②</sup> 官方资料参见:《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207-00004卷。



台湾当局精心策划的暗杀周总理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此凶险事件成为新中国首场多边外交令人惊心动魄的序幕。

## 一、万隆会议的中国外交：乐观与艰难

1953年8月，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一译阿里·沙斯特洛阿米佐约）率先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构想。<sup>①</sup>万隆会议是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阶段与欧洲殖民帝国风雨飘摇的情况下召开的。在二战后，东南亚地区摆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并继续这种反殖斗争，南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加速。同时，中东地区因1951年发表的《联合国关于中东经济情况的报告》中有关“世界最大的储油区”而成为国际资本觊觎的目标，并同时激发了民族主义反抗情绪。非洲的独立意识也在觉醒，西印度群岛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sup>②</sup>与此同时，抗美援朝战争以美帝国主义的失败为结果，中国以自己的威望屹立在世界东方。一方面是殖民帝国的衰落，另一方面是亚非国家的崛起。亚非国家对西方操控的国际不平等秩序表达出强烈不满，同时也意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万隆会议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召开。

万隆会议的29个参会国家分属各种不同的集团或派别。“参加会议的有阿拉伯集团、非洲国家、亚洲的中立主义者，加上两个共产党国家、中东和亚洲的一批明显反共国家，代表了极不相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和政策。”<sup>③</sup>当时亚非国家从国际政治或意识形态上主要分属三个派别。第一派是与西方国家走得较近的集团。美国在1954年策划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即东南亚条约组织）包括多个东南亚国家。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土耳其和伊拉克还在美国策划下于1955年2月24日签订“伊土条约”，后来经过扩员成为具有军事合作性质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南越政权和菲律宾当时是积

---

<sup>①</sup> 陈菲：《万隆会议提升中国外交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7月4日，[https://cssn.cn/skgz/bwyc/202407/t20240704\\_5762710.shtml](https://cssn.cn/skgz/bwyc/202407/t20240704_5762710.shtml)。在1954年底举行的茂物会议上，万隆会议的5个发起国根据所谓“独立政府原则”，由与会各国提名可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共提出30个国家，包括5个发起国。这些国家是：发起国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受邀的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越南政权、中非联邦等25个国家和地区。中非联邦后来没有出席会议。

<sup>②</sup> R. Palme Dutt, *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3, pp. 88-100.

<sup>③</sup> 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极反共的国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爱德华·兰斯代尔（Edward Geary Lansdale, 1908—1987）担任过菲律宾国防部长拉蒙·麦格赛赛（Ramon Magsaysay, 1907—1957，曾任总统）的顾问。<sup>①</sup>第二派是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属“共产党国家”。第三派也是最大的一派，是以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和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代表的中立集团。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成就，特别是在刚结束的抗美援朝中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但由于意识形态不同，许多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对中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猜疑，中国外交面临着多重困难。在参会的29个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只有6个国家，即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诸多国家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颇多。在万隆会议上，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面临着四重压力。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竭尽全力地阻止中国代表团参会，二是台湾当局派出各路人马进行围追堵截，三是诸多亚非国家由于误解产生的对共产党国家的敌视，四是东南亚各国针对本国存在大量华侨而产生的担忧甚至恐惧。

美国因亚非会议没有邀请自己却反而向在朝鲜战场上打败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出邀请感到十分恼怒。美国政府一直坚持反华立场，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击和渗透，包括各种情报活动。然而，“在对付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与情报局有关的间谍活动获得成功。”<sup>②</sup>针对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美国派出了一个由七十多人组成的庞大“记者团”，包括早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就十分活跃的间谍和从香港、台北调来的职业特务，极力阻碍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同时一方面力图破坏这次会议的召开，另一方面在与会国家中制造分裂并收集各方面情报。蒋介石集团更是不遗余力，部署在印尼的恐怖组织“铁血团”直接参与破坏活动，“与印尼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1954年被印尼政府驱逐出境的台湾特务头目章勋义、郭义春、吴扬明等也潜回万隆布置破坏行动。<sup>③</sup>1955年4月16日即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的前一天，一封署名为“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的匿名信送到中国大

① 维克托·马凯蒂、约翰·马克斯著，曹山、慕絮、知然译：《中央情报局与情报崇拜》，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0页。

② 同上，第23页。

③ 朱毅：《万隆交响曲——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使馆，信中提到“中国国民党驻雅加达直属支部于3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28人之敢死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暗杀队于3月10日在红溪党部组成”。信中提到这些暗杀队员持有美国大使馆所发的无声手枪和印尼币20万盾，事成后再加20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40万盾”。此人最后提醒：“请大使馆通知治安当局，保全周氏。”<sup>①</sup>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和苏联集团，有的国家加入了倾向西方的防务条约，还有的受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的影响，在会议上直接表现出与中立派不同以及与中国敌对的态度。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位相当孤立，与亚非国家关系显得颇为紧张。东南亚的华侨问题也是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压力。约1000万华侨成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新加坡等国急切关注的问题。

## 二、万隆会议的中国外交：布局与实践

“周恩来在万隆所表现出来的外交手段真是巧妙绝伦。”<sup>②</sup>这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时任美国记者鲍大可（A. Doak Barnett，1921—1999）表达的敬佩之情。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做了极为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在大会期间的表现也充分显示了灵活务实的风度和求同存异的立场，从而在布局与实践上使万隆会议成为中国首次客场的多边外交取得了成功。

1954年6月，周恩来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期间，尼赫鲁总理向他透露了正在酝酿召开的亚非国际会议。周总理当即表示赞同和支持，并随后指示外交部门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并研究如何支持亚非会议的召开。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期间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

1954年11月2—23日，中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廖承志与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驻华大使莫诺努都和其外交部主管司长就华侨双重国籍问题在北京举行正式会议，拟出解决双重国籍的条约（草案）。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时，向毛泽东主席谈及亚

---

① 朱毅：《万隆交响曲——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② 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非会议并邀请中国政府参加。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会议。毛主席当即表示支持，并说明中国希望参加。

1954年12月29日，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五国总理在雅加达北部的茂物聚会。会后公报宣布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定于1955年4月最后一周在印尼的万隆召开。

1955年1月，联合发起国委托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给中国政府发来邀请电，周恩来总理欣然答复应邀参加。中国外交部完成了“参加亚非会议在文化友好方面准备工作的初步方案”和“参加亚非会议初步工作计划草案”。

1955年3月2日，周总理召集赴亚非会议的第一批先遣组人员在中南海西花厅开会。除周总理外，参加会议的有总理秘书兼先遣组组长姚力、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华侨事务委员会（中侨委）副主任廖承志、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中侨委国外司专员朱毅等。

1955年4月4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充分讨论后通过了这些文件。

1955年4月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关于我国参加亚非会议问题的报告》和《关于提请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名单的报告》。

1955年4月13日，新华社宣布毛主席任命周总理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

中国希望在这次重要会议上既能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又能消除大多数国家的误解并广交朋友，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外交关系创造条件。早在195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指出了中印两国的一致性，“我们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sup>①</sup>他还表示中国希望与泰国、菲律宾搞好关系，并强调“我们需要朋友”。<sup>①</sup>周总理与1954年12月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举行了四次会谈，表达了促进双方关系的良好愿望。毛泽东主席会见吴努总理时表示：“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落实，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

---

<sup>①</sup> 毛泽东：《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1、365页。

“国家不应分大小……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并强调中国与缅甸的关系“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sup>①</sup>万隆会议之前，中国做了周密计划。会议期间主要进行四项工作：会议发言时表明立场，意见对立时调和冲突，会议期间广交朋友，会场以外重点交往。

### 1. 会议召开前

初步工作计划草案提出参加会议的4项任务：一是发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扩大和平地区，反对制造战争的集团，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二是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主权；三是发展正常贸易及经济合作，加强与与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四是争取与若干亚非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会议的准备工作的政策、资料、经济、新闻宣传、宗教和行政等6个方面，将参会国分为“和平中立”“接近和平中立”“接近反对和平中立”三类，制定相应措施，确定整个活动重点在于会外接触，通过会场外的各种机会来解释我们的立场并争取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为了全面为会议作好准备，政府还专门邀请了专家顾问就议程、着装等各种问题提出建议，要求各驻外使馆及时反馈情况，并专门为会议宣传准备了有关新中国发展的各方面资料。<sup>②</sup>

### 2. 会议进行中

在会议期间的私下讨论或公开进行时，以尼赫鲁为代表的中立派意见不时遭到亲西方派的挑战或否决。例如，伊拉克提到“三股势力”威胁世界和平：老式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随后，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的代表都谈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认为有必要对其采取防范措施”。<sup>③</sup>菲律宾代表罗慕洛甚至提出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sup>④</sup>面对这些激烈发言和敌对立场，周总理扮演的是温和调解者的角色。他将表达中国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正式发言稿印发给参会者，并利用大会舞台作了补充发言，既表达了立场，也调和了冲突。他对大会发言中有关中国的三个主要问题逐个进行了细致的回答：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影响亚非国家

---

① 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378、382页。

② 夏莉萍：《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75—77页。

③ 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④ 朱毅：《万隆交响曲——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的团结；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所谓颠覆问题主要涉及华侨和少数民族，中国政府准备与相关国家共同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人情入理的解释取得了满意的效果。<sup>①</sup>他突出的是亚非国家相似的历史经历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共同地位，并强调亚非国家的共同诉求和愿望：亚非大多数国家都遭受过甚至仍然遭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正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同时，他指出中国代表团参会的真实目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sup>②</sup>

中国代表团利用各种机会广交朋友。首先，从一致立场上团结各国，“任意摆布亚非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决心维护世界和平，就没有人能够把我们拖入战争；如果我们决心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就没有人能够继续奴役我们；如果我们决心友好合作，就没有人能够分裂我们。”其次，利用各种机会交流意见以打消对中国的误解和疑虑。周总理真诚表达自己的看法，尊重他人的选择和意见，并提出为了促进和平和合作，“亚非各国应该首先根据共同的利益，谋求相互间的亲善和合作，建立友好和睦邻的关系。”<sup>③</sup>中国代表团也善于利用会场以外的机会重点交往相关国家的代表。当时参加安保工作的朱毅记载：“周恩来和陈毅除忙于参加大小会议外，还要充分利用这次宝贵的机会广泛结识亚非各国领导人。这样，在别墅住处举行小型宴请的日程就安排得满满的。有时设午宴，有时一晚请两次客。”这些客人大多数来自未建交的国家，从而增加了相互了解，有效促进了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拓展了外交空间。<sup>④</sup>亚非会议取得圆满成功。<sup>⑤</sup>

### 三、万隆会议的中国外交：成果与影响

亚非会议的参会国分成了不同派别，是什么因素使它们走到一起

---

① 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11页；朱毅：《万隆交响曲——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页。

②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125页。

③ 同上，第119页。

④ 朱毅：《万隆交响曲——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⑤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1955年4月24日于万隆），《国际条约集（1953—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423—430页。

呢？换言之，它们的共同点是什么？用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时任记者鲍大可的话来说，这些国家的共性包括以下几点：都愿意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都反对殖民主义；都支持各民族自决和要求种族平等；都想要发展经济以赶上世界其他地方；都希望和平。<sup>①</sup>他忽略了重要的一点，亚非国家在历史上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统治，在现存国际秩序中处于劣势地位。这种共同经历是亚非国家的突出共性。<sup>②</sup>这些共同点使这些分属不同集团的亚非国家走到一起，平等地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共识。正如周总理在闭幕式发言中指出：“我们亚非各国人民是具有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愿望的，所以我们才能在反对殖民主义、拥护世界和平和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合作上取得如此成就。”<sup>③</sup>中国外交在万隆会议上取得的成果显而易见。

### 1. 赢得了朋友

万隆会议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为后来的亚非关系发展打下了基础。毛主席在会见万隆会议后来访的印尼总理时表示：“亚非人民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sup>④</sup>由于对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及时处理，中国与印尼以及其他类似国家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除此之外，会前曾提到须重点关注的一些国家包括埃及和日本。亚非会议为中国与埃及和日本的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与埃及和日本两国关系的改善。周恩来总理曾在会议期间宴请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双方进行了友好会谈并达成了一些共识。埃及一直希望与中国建交，但问题卡在与台湾的关系上。通过此次会议的接触，纳赛尔下定决心，埃及终于在1956年6月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日本的关系的发展也得益于周总理与日本参会代表、经济企划厅长官高碕达之助的会晤。这次会晤开辟了中日两国贸易乃至邦交正常化的道路，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在会上主动给日本送上一份厚礼。日本代表在万隆会议的和平促进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一项“和平宣言”提案，却难以通过。周恩来立即表示：中国愿意撤回自己的提案以支持日本提出的“和平宣言”提案。这样日本的“和平宣言”提案在万隆会议上

---

① 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② 李安山：《论国际关系史中的平等观念与文明互鉴》，《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④ 毛泽东：《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页。

最终获得通过。这对曾欺辱中国的日本来说难以想象，既使参会国改变了对新中国的误解，也使高崎达之助成为一位全身心投入到促进中日关系发展事业之中的日本友人。这次会晤的成功更明确了中国通过“积累渐进、以民促官”的模式发展中日关系的信心。<sup>①</sup>

## 2. 收获了尊重

通过亚非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周总理的发言及其待人接物的方式，中国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是来自参会国的友好代表，也包括先前不那么友好国家的代表，还包括来自敌对国的记者。周恩来总理在4月19日下午的发言获得极大的成功，不仅打消了诸多国家领导人对红色中国的恐惧心态，更是赢得了与会者的尊重。周总理发言结束后，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说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喜欢他的演说！”菲律宾代表罗慕洛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sup>②</sup>1955年4月25日，黎巴嫩驻美国大使查尔斯·马立克当面赞扬了周总理高超的外交技巧：“总理先生，我想我可以说，这次会议（指亚非会议）上你赢得了每一次战斗……在每一场你要参加或者你允许自己参加的重要战斗中，你都获了胜。”<sup>③</sup>黎巴嫩在亚非会议上的立场是亲西方的，但这位官员却在会后对周总理表达了由衷的敬意，这是中国外交赢得亚非国家尊重的直接表现。美国记者鲍大可赞扬：“周恩来的发言是中国以和解态度与会的绝好说明，他的发言是前两天公开会议的高潮。”“作为共产主义在这次会议上的代表，他出面来平息一切，他是调解人和和事佬。他向每一个人作出诚心善意的保证。”<sup>④</sup>

## 3. 消除了误解

由于周总理在会议上就几个不少国家关注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这些国家消除了对中国的疑惑和误解。首先，有关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不应该影响双边关系。“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在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

① 李广民：《周恩来与高崎达之助万隆会晤述评——记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忽略的两小时》，《党的文献》，2003年第1期。

② 朱毅：《万隆交响曲——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2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

④ 鲍大可著，弓乃文译：《周恩来在万隆——美记者鲍大可记亚非会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3页。



关系的基础。”其次，中国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再次，“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中国政府准备与任何政府协商解决这一问题，也不会利用边境的少数民族去颠覆邻国。<sup>①</sup>中国与印尼有关两国侨民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签订不仅使印尼政府放下了一块心病，也使有华侨存在的其他东南亚国家可以仿照中国—印尼模式来解决类似问题。<sup>②</sup>周总理于4月27日在雅加达向印尼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时表示：条约的签订是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我们两国间一个由长期的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难问题，已经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sup>③</sup>有关国家听到这些解释都表示理解。

#### 4. 促进了工作

万隆会议后迎来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建交的高潮，包括尼泊尔（1955）、埃及（1956）、叙利亚（1956）、也门（1956）、斯里兰卡（1957）、柬埔寨（1958）、伊拉克（1958）、摩洛哥（1958）、阿尔及利亚（1958）、几内亚（1959）、马里（1960）、索马里（1960）等国。截至1964年，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49个国家中，亚非国家有30个，占建交国的大部分，可以说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已经打开。中国外交部在1955年7月向中央提出了“亚非会议后加强和开展对亚非国家友好关系的意见草案”。这个草案不仅提出了应该吸收亚非会议的经验，从多方面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友好交往工作、宣传工作和研究工作，培养为开展与亚非国家工作所需的干部队伍，还特别提到在各个方面如何做细致的工作，如派出贸易、文化艺术等各种代表团，促进宗教交流方面的工作，同时邀请亚非国家的妇女、青年、工会以及有学术和社会地位的各方面人士访问中国。<sup>④</sup>

---

①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5页。

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就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在北京互换批准书的新闻公报1960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60》第七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第22—23页。

③ 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④ 夏莉萍：《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79页。

#### 四、万隆会议促进了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

万隆会议确实为新中国多边外交树立了典范。然而，从亚非关系看，万隆会议为亚非拉的团结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发布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通过了包括“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十项原则，“确信按照这些原则的友好合作对于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和安全将会作出有效的贡献，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促进大家的共同繁荣和福利。”<sup>①</sup>从国际政治看，万隆会议第一次将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在没有西方国家的参与和干涉下讨论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国际问题，为亚非国家的进一步团结合作和国际和平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此，亚非拉国家开始活跃在世界舞台上，随后出现了各种相关的称呼，如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不结盟国家、77国集团、南方国家、第三世界以及新兴经济体等。<sup>②</sup>这些称呼或褒或贬或中立，但表达的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国家，且集中在亚非拉地区。近年来，“全球南方”的概念开始流行，这既代表着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亚非拉国家团结起来以改变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正当反映，同时说明世界政治格局在进一步改变。<sup>③</sup>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万隆会议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万隆会议与中国—中东关系

肖 宪

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亚非人民的觉醒，亚非国家

---

①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1955年4月24日于万隆），《国际条约集（1953—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430页。

② Li Anshan, “BRICS: Dynamics, resilience and role of China”, *BRICS-Africa: Partnership and Interaction*, Moscow: Institute for African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 pp.122-134; 李安山：《非洲现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564—567页。

③ 李安山：《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21—34页。

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独立登上国际舞台。这次会议也是中国—中东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万隆会议上，中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进行了直接接触，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正是万隆会议之后，中国才在中东地区取得外交突破，同一些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 一、关于是否邀请以色列和中国参会

发起万隆会议的亚洲五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锡兰<sup>①</sup>）总理于1954年12月在印尼的茂物举行会议，讨论万隆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应该邀请哪些国家参加万隆会议。据有关资料，当时引起争论最多的是两个国家：以色列和中国。

以色列是根据1947年11月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而建立的国家，建国前曾与托管巴勒斯坦的英国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因此，以色列要求参加万隆会议，称自己作为一个摆脱殖民统治而新独立的亚洲国家，应该有权参加亚非会议。在是否邀请以色列问题上，茂物会议五个国家的态度各有不同：当时印度已原则上承认了以色列，正准备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缅甸已经与以色列建交，两国关系很不错，缅甸总理吴努坚决支持邀请以色列参会；巴基斯坦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1947年就反对联合国分治决议，因而此时坚决反对邀请以色列参会；印尼国内有很多穆斯林，所以也不同意让以色列参会；锡兰对以色列的态度比较中庸，既不很欢迎但也不排斥。这样，起主导作用的印度的态度就很关键了。印度总理尼赫鲁考虑到，在拟邀请的国家中，有8个阿拉伯国家和12个伊斯兰国家，如果邀请以色列出席，那么所有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和一些伊斯兰国家就会退出，因此最后决定不邀请以色列参加万隆会议。

在讨论是否应邀请中国与会时，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提出，如果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那么阿拉伯国家和泰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很有可能拒绝出席会议，因为它们均未承认共产党中国。虽然发起万隆会议的5个国家中，有4个（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已与中国建交，但在被邀请参会的其余25个国家中，有18个国家尚未承认新中国，而且多数国家仍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

---

<sup>①</sup> 锡兰，今斯里兰卡。

但当时与中国关系良好的缅甸坚决支持邀请中国，缅甸总理吴努甚至表示，如果不邀请中国，缅甸也就可能不参加会议。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会议主席、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主张邀请中国，并表示愿意说服阿拉伯国家前来参加亚非会议。最后，与会者达成了一项有先决条件的决议：“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承诺向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和说明后，会议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亚非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要促进亚非国家之间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因此，茂物会议的一项原则是，被邀请的任何国家都不涉及其意识形态，也不涉及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被邀请国是否已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或者是否有外交关系并不重要。巴基斯坦虽然在 1951 年就已经与新中国建交，但当时两国关系并不密切，而印度同中国的关系却很好。为了搞平衡，巴基斯坦建议邀请亚洲“最大的反共国家”日本参加万隆会议，也得到了其余四国的同意。

## 二、求同存异：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交往

中国政府对参加万隆会议非常重视，组成了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参加会议的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中国同若干亚非国家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出席万隆会议的 29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阿富汗、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土耳其、也门、利比亚和苏丹等 13 个中东北非国家；还未取得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有关组织也作为非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中东国家与会，才使万隆会议成了一个中国与中东国家直接接触的好机会。针对有这么多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出席会议的情况，中国代表团专门请了一位国内著名的伊斯兰教阿訇、当时已 82 岁的达浦生作为代表团的顾问。达浦生以前曾两次访问中东，到过沙特阿拉伯、埃及，是时任中国伊协副主任、伊斯兰经学院院长。

事实证明，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增进了中国同许多亚非国家的交往。对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万隆会议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新中国首次同阿拉伯国家开始正式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在会内会外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同埃及、也门、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情况，听取他们对中东问题的看法，成效显著。周恩来在前往印尼的途中，曾在缅甸仰光停留了两天，在这里与缅甸总理吴努、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等人进行了会谈。这是周恩来与纳赛尔的第一次见面，随后两人又在万隆举行了会晤。纳赛尔不仅是出席会议的阿拉伯国家中级别最高的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威望正在迅速上升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周恩来与纳赛尔多次接触后，两人也结下了良好的个人友谊。中国—阿拉伯关系在会后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万隆会议使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巴勒斯坦问题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关注之一。会议之前，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并无太多了解，也没有明确的态度。万隆会议上，各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强调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致立场，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高度重视。当时有两位著名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一位是耶路撒冷宗教领袖、大穆夫提哈吉·阿明·侯赛尼，另一位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领导人、后出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第一任主席的艾哈迈德·舒凯里，分别以也门代表团和叙利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出席了万隆会议。在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强烈要求下，万隆会议《公报》明确宣布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并要求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这些情况无疑都提高了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如果说在万隆会议之前，中国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都还只是一般性、没有多少倾向性的话，那么，正是万隆会议才使中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使中国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态度，对中国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的第一个发言中还没有提到巴勒斯坦问题，但在会议闭幕时的发言中就强调了中国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加深。

第三，参加万隆会议的中东及周边国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在努力摆脱西方控制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如埃及、叙利亚、也门、沙特阿拉伯等；另一类是仍与西方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国家，如已参加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的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中国在会议期间与第一类国家积极交往，对第二类国家则采取不与之对抗、不展开争论的态度。例如，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在发言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攻击共产主义，称共产主义是当今造成世界动乱的第三股势力，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并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式殖



民主义”。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代表也谈到了“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

周恩来在发言中回应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应该承认，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还特别指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段话主要就是回应伊拉克等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中国一方面避免与这些国家发生正面冲突，另一方面又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这种顾全大局、广交朋友的做法，赢得了多数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尊敬和好感。

### 三、万隆会议后中国—中东关系的突破

万隆会议前，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只有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五国（越南、朝鲜、蒙古为社会主义国家），当时中东非洲没有一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而从万隆会议后到1959年的短短四年里，就有埃及、尼泊尔等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0—1964年又有加纳等14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

阿拉伯世界中最早同新中国开始往来并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埃及。埃及在中东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国家，有着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而且地处中东地区的中心，扼守着东西方之间的咽喉水道——苏伊士运河。同时，埃及也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二战以后，埃及成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后，其总部一直设在开罗。埃及同中国的关系如何，对其他中东国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万隆会议后不久，中国的经贸和文化代表团就应邀前往中东地区访问，与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签订了十多项经贸和文化协定。1956年5月，中国与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埃及率先承认新中国，对中国在中东打开外交局面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埃及的带动下，叙利亚、也门也先后在1956年同中国建交。埃及总统纳赛尔说：“万隆会议为加强埃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把我们团结了起来，并确定了我们的目标。”

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建立了联系。会议期间，经过周恩来总理与沙特阿拉伯首相兼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后成为国王）当面沟通和协商，沙特方面同意给予中国穆

斯林朝觐团入境签证。1956年7月，由达浦生阿訇任团长和19位团员组成的新中国第一个朝觐团经香港、巴基斯坦前往麦加朝觐。更重要的是，通过万隆会议，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开始有了改变，而中国对中东地区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了。可以说，万隆会议是当代中国—中东关系史上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新中国与中东地区基本上还处于没有往来的状态，而在此之后，中国便开始了与中东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日趋频繁的交往。

万隆会议还给中国与中东关系带来了一个戏剧性的发展，就是中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后，以色列很快就宣布予以承认，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也回电表示感谢，并希望两国尽快建交。1950年6月，中、以驻苏联外交代表就建交问题进行了沟通。但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以色列为了不得罪美国，便停止了同中国的外交联系，采取观望态度。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中、以再次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并取得了积极进展。1954年9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我国同阿富汗和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的事宜，正在接触中”。但是以色列方面却仍因顾及美国的态度而动作迟缓。

以色列夏里特政府经过再三犹豫，尤其是当它要求参加万隆会议遭到拒绝后，终于下决心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4月29日，也就是万隆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以色列外交部致函中国外交部，明确表示以色列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然而却为时已晚，中国已经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着眼于阿拉伯国家一大片。对以方的表示，中方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表示两国建交的时机不成熟。至此，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和以色列的外交来往也就结束了。1956年10月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公开批评以色列，后来随着中国—阿拉伯关系的发展，中国对以色列的批评也日趋激烈。一直到1992年，中以两国才建立外交关系。对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以色列政府犹豫不决，没有积极采取行动同中国建交，一些以色列学者和外交官深感惋惜，称之为“失去的历史性机会”，并认为是以色列外交的一次“失误”。

## 万隆会议与中国—东南亚关系

王国平

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到来，西方殖民势力开始陆续渗透、入侵东南亚，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被迫进入殖民体系，东南亚正常的发展历程被打断，东南亚地区的社会发展因此受到西方殖民势力的侵扰，正常的历史进程由此逐步发生改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亚洲东部地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亚洲东部地区，面对屈辱而残酷的殖民统治，东亚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探求民族解放和复兴之道，作出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各国的民族意识在不断觉醒，它们采取了各种斗争方式，争取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发展团结合作的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一、万隆精神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贡献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齐聚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历史性会议。在万隆会议上，亚洲国家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印度尼西亚既是会议的东道国，又是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除印尼之外，会议的其他四个发起国全部都来自亚洲，缅甸是五个发起国当中的另一个东南亚国家。当时东南亚地区的国家，除马来亚联合邦以外，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菲律宾、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政权和印度尼西亚）都参加了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率领参加会议。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万隆会议的贡献还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会议文件所吸收，成为“十项原则”的基础性文件。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总理会谈的联合声明中一致同意并共同倡导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公布，受到了亚非拉和欧洲国家广泛的支持和

响应，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表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利益诉求。战后初期，亚洲地区，特别是东亚、东南亚成为反帝反殖斗争的中心地区，广大前殖民地国家相继赢得独立，而战后美苏之间日益加剧的冷战格局，帝国主义对亚非地区和所谓的“中间地带”的争夺，对亚非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种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发布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极大地推动了亚非拉人民解放运动的发展。广大亚非拉国家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出发，坚持执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拒绝参加侵略性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国家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亚非国家还认识到，为维护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国际上有相似处境的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因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是亚非人民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产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 二、万隆精神引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亚非拉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组合的新阶段。在万隆会议召开前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快速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国与东南亚毗邻并有着相似的历史和相近的文化背景，在世界和地区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识。因此，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战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双方间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与合作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

中国政府积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重视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逐渐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信任和支持。1950年，中国先后与东南亚地区的越南、印尼、缅甸建立外交关系。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万隆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与泰国、中国与菲律宾关系出现了和解与松动，双方代表团进行了接触，甚至探讨建交问题，但因美国的干预和阻扰，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虽然如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关系因为有了万隆精神的引领，有了明显的改善和

发展。1958年4月22日,本着万隆会议的“团结、友谊、合作”精神,中国与印尼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不仅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印尼人民的友谊,而且为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提供了榜样,为后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7月,中国与柬埔寨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当时的东南亚引起了良好的反响。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际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形势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对彼此的政策都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由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中国试验氢弹成功。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加上国际形势的其他变化,尤其是1968年英国宣布在1971年以前撤出其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军队。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讲话,宣布美国将不再卷入像越南战争那样的战争,“亚洲国家要自己照顾自己的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御问题。”1969年8月,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提出建立“亚洲安全体系”,以替代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作用,遭到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加上中美关系的改善,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开始重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问题。

1974年至1975年,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相继与中国建交,东盟成立初期对中国的不信任态度有了明显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格局解体,各种力量纷纷重组,世界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朗,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1990—1997年,东南亚与中国关系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1990年,印尼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新加坡随即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文莱也紧随其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个时期,老挝、越南与中国相继实现关系正常化。从1991年起,中国外长每年都应邀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从1994年起,中国外长每年都应邀出席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

1997年以后,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的指引下,中国通过实施自由贸易、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等路径,加强了同东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除东盟成员之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区域外国家。2007年和2008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议的《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和《投资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式启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2012年，由东盟发起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经过8年时间的艰苦谈判，2020年由10个东盟成员国和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成员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2022年，这一协定正式生效。RCEP是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也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里程碑。

总的来说，万隆会议和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成功地引领了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健康发展，出现了像中缅胞波情、中泰一家亲这样的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成功范例。

## 万隆会议与中国—南亚关系

林延明

70年前，第一届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史称“万隆会议”。以此为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陆续实现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南方国家开始团结起来，并且自觉以一个集体正式走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同与会的南亚国家广泛接触，通过富有成效的沟通交流，推动彼此之间的关系在会后快速进入蜜月期。万隆会议之后，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虽然在一定时期由于历史悬案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波折起伏，但都始终认可和传承万隆精神，并以万隆精神为引领，总体上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交流合作态势。当前，“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引人瞩目，已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和“百年变局的希望所在”<sup>①</sup>，而万隆精神历经70年的传承发展仍然具备强大生命力和广泛影响力，应被视为同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中国与南亚各国加强团结友谊、促进合作共赢的基石，以及凝聚新的共识、追求和平发展的旗帜。

---

<sup>①</sup> 《王毅：“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人民政协网，2024年3月7日，<https://www.rmzxx.com.cn/c/2024-03-07/3504709.shtml>。

## 一、万隆会议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增信释疑的经典范例

作为第一次由亚非人民自己举办、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万隆会议是经过多方协商、艰苦筹备才得以胜利召开的。会前，在关于是否邀请中国参会的问题上，发起会议的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五国存在明显的立场和态度分歧。

1954年12月，上述五国总理齐聚印尼茂物，召开万隆会议的筹备会议，而中国能否成为万隆会议邀请对象问题又一次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其中，印度早在1950年4月1日就与中国建交，是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邀请中国出席万隆会议持明确支持态度。巴基斯坦虽也在1951年5月21日与中国正式建交，但由于当时巴美军事同盟关系，巴基斯坦在外交立场上偏向美西方，故不同意邀请中国参会。锡兰与中国在当时尚未建交，且锡兰政府也是亲西方的立场，因此同样反对中国与会。在此情况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在邀请中国出席亚非会议方面”，以及“在排除美国等西方国家挑拨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关系、阻挠中国参加亚非会议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促成了中国最终成为被邀请出席的参会国。<sup>①</sup>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万隆会议如期举行，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的全部议程，并且在会议期间同与会的南亚各国广泛接触、深入沟通，使得新生社会主义政权在当时国际背景下面临的诸多外交难题逐一迎刃而解。

一方面是“增信”，即加深了解、增强互信，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与印度在万隆会议前后的相互支持。万隆会议前，美国授意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赴新德里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意图通过施压迫使印方放弃支持中国参会的立场，遭到了尼赫鲁的断然拒绝。施压不成，美国又唆使台湾反华势力针对原定执行中国代表团包机任务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制造爆炸事件，所幸周恩来总理临时改变路线，此次阴谋暗杀宣告失败。万隆会议上，中印两国领导人频繁互动，进一步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认识，也推动了中印关系的发展。例如，在大会开幕式上，

<sup>①</sup> 尚功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尼赫鲁以会议发起者的身份，向与会各国领导人热情介绍并引见周恩来总理，不仅为中国代表团的快速融入会议氛围“起了牵线搭桥的作用”，而且也大大巩固了中印两国在政治与战略上的相互信任。<sup>①</sup>

另一方面是“释疑”，即化解误会、消除疑虑，这主要体现在中国与锡兰在万隆会议期间的良性互动。当时，由于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大多数南亚国家对中国既不了解也不信任，尤其是亲美西方的锡兰更对中国颇多怀疑与误解，甚至提出要求会议讨论反对一切形式殖民主义这一针对中国意味浓厚的议题，使会议在小组讨论阶段面临分歧扩大、争议加剧的局面。对此，周恩来总理在休会期间主动与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进行了长时间的恳切沟通，化解了科特拉瓦拉对所谓“中国输出革命论”的担忧，为后续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

显而易见，万隆会议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提供了直接对话的良好平台，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增信释疑的关键契机与经典范例。正因如此，在万隆会议后，中国迎来了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高潮，先后于1955年8月1日和1957年2月7日同尼泊尔、锡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此外，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周恩来总理率团出访亚欧十一国期间，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锡兰等南亚国家受到了热情和盛大的欢迎，尤其是在印度国内，到处都能听到“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两国人民是兄弟）的亲切欢呼声。<sup>②</sup>

## 二、中国与南亚国家为万隆会议胜利召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4月24日，万隆会议胜利闭幕，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在这一最重要的会议成果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与南亚国家携手合作，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特别是中国最早完整提出，后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处理国际关系十项原则的理念来源与框架基础。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及和平共处。在关于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的谈判过程中，尽管两国分歧明显、交锋激烈，但由于双方都

---

① 张敏秋：《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 《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之一）》，中国政府网，2008年2月2日，[https://www.gov.cn/2008lh/content\\_899646.htm](https://www.gov.cn/2008lh/content_899646.htm)。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谈判的指导方针，从而推动谈判始终沿着友好融洽的轨道前进，并促使中印双方在1954年4月29日签署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整写入该协定的序言。<sup>①</sup>此后，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并推动五项原则被万隆会议的与会国广泛认可和接受。

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全部吸纳，在对措辞提法进行一定调整改变的同时，延伸拓展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具体而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被表述为“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拓展了关于“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内容；“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被分别表述为“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及“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了关于“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以及“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等内容；“平等互惠”被表述为“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及“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和平共处”在措辞上调整为亚非国家“作为和睦的邻邦彼此实行宽容，和平相处，并发展友好合作”；“平等互惠”调整为“平等互利”。<sup>②</sup>

毋庸置疑，中国和南亚国家都为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尤其是为会议最后公报的发表以及处理国际关系十项原则的提出，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并且中国与南亚国家在会议期间的友好互动也生动演绎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

### 三、弘扬万隆精神是中国与南亚关系发展的必由之路

时至今日，万隆会议已过去了70年，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却并没有因时代的发展而褪色，反而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始终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石以及彼此深化务实合作的思想指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国际形势相对以往发生了更

<sup>①</sup> 郑瑞祥主编：《中国和印度的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95—97页。

<sup>②</sup>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5年4月15日，[https://www.fmprc.gov.cn/zyxw/200504/t20050415\\_284634.shtml](https://www.fmprc.gov.cn/zyxw/200504/t20050415_284634.shtml)。

加深刻复杂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大为改变，使得国际力量对比愈发呈现出趋向平衡的变化趋势，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也不可能逆转。鉴于此，中国与南亚国家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下，以万隆精神为桥梁和纽带，进一步凝聚命运共同体意识，超越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丛林法则桎梏和零和博弈窠臼，携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是要不断赋予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到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但也应结合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赋予新内涵、注入新动力。为此，中国与南亚国家应在大力弘扬万隆精神的同时，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与世界上一切和平和进步的力量一道携手前行，直面全球化发展遭遇逆风、发达国家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把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发展赤字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优先方向和促进彼此关系发展的关键举措，从而最大限度地推动中国与南亚各国发展机会、发展权益和发展成果等方面的交融共享。

二是要不断开创彼此合作共赢的新局面。中国与南亚国家地理上相互毗邻，经济上互依互补，文化上交流互鉴，在各领域深化交流和加强合作的潜力巨大、空间广阔。为此，中国与南亚国家在面对国情差异巨大的现实时，应继承和秉持万隆会议期间的求同存异方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合作共赢的原则，努力寻求彼此之间加强交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加强发展战略的有效对接，推动各领域各层次的交往互动，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核心位置，着力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共同做万隆精神的践行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世界经济的动力源。

三是要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sup>①</sup>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听到包括中国与南亚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的声音。针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中国不能缺席，南亚国家也不能缺席。为此，中国与南亚国家应在继承和发扬万隆精神的基础上，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在面对世

---

<sup>①</sup>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第13—14页。



界性突发危机和全球性共同挑战的过程中团结协作、携手应对、担当作为，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不断贡献“全球南方”的智慧和力量。

概而言之，万隆会议期间的交往互动和增信释疑是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共同历史记忆，万隆会议的重要成果也离不开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共同历史贡献。今天，万隆精神不仅仍是中国与南亚国家团结合作的一种象征，也仍是指引中国与南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一面旗帜。面向未来，唯有继承和发扬万隆精神，始终坚持求同存异、深化务实合作的方针，才能推动中国与南亚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破浪前行、开拓新局。

## 弘扬“万隆会议”精神 促进“全球南方”崛起

陈利君

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不确定的世界，才能更好促进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著名的“万隆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亚非共同关心的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通过了包括十项原则在内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就相关国际问题共同发声，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又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探索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和平发展之路。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全球南方”国家要大力弘扬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团结合作，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合理化，促进共同发展，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万隆会议与“全球南方”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西方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与规则，发展中国家虽然数量众多，但各自为政，对国际事务基本没有什么发言权。70年前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南方国家”进行“南南合作”的开端，虽

然没有直接提出“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的概念，但这次会议却是亚非发展中国家展示团结合作、提出新的国际理念、发出时代之声的大会，在“全球南方”乃至世界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万隆会议主张和强调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相互尊重、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友好关系、推动经济合作和促进文化交流等理念得到了广泛认同和接受，成为之后发展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有力推动了“南南合作”，提升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也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1957年第一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在埃及召开，1966年第一届亚非拉人民团结会议在古巴召开，1961年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G77）正式成立并发表了“联合宣言”，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1977年联合国成立了“南北委员会”。通过这些会议和活动，“全球南方”国家表达了加强团结合作、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期盼与心声，促进了“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sup>①</sup>，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一批“南方国家”加快了改革开放步伐，经济发展加快，国际影响力扩大。2003年12月，联合国将每年12月19日定为“南南合作日”。2006年“全球南方”的重要代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金砖国家”外长举行首次会晤，2009年“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启动。2010年南非加入“金砖机制”。2023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15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邀请了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后退出）、伊朗、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国家。2024年10月，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上任后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的意愿。2025年1月6日，金砖国家2025年轮值主席国巴西宣布，印尼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2025年金砖10国的GDP总量预计将达32万亿美元，占全球的比重约30%。

另外，上海合作组织（SCO）、二十国集团（G20）、七十七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机制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或主导的全球治理平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到2024年7月，有10个成员国，已举办成员国元首理事会24次。二十国集团于2023

---

<sup>①</sup> “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南方国家”间的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

年将非洲联盟纳入正式成员，2024 年 11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 G20 领导人第 19 次峰会。而七十七国集团已有 130 多个成员，其最高决策机构是南方首脑会议，迄今已举办 3 届，“全球南方”国家对完善全球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全球南方”转移。过去 20 年，“全球南方”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80%。目前，“全球南方”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 40%，占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超过 50%，不再是原来可有可无的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到 2028 年，金砖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35%）将大大超过七国集团（27.8%）。预计到 2032 年，世界三大经济体中将有两个（中国和印度）来自“全球南方”。未来，“全球南方”将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至关重要的力量。

## 二、中国是“全球南方”重要成员

中国既是万隆会议的亲历者和万隆精神的贡献者，更是万隆精神的践行者和弘扬者。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万隆会议召开以来，无论在倡导多边主义、推动“南南合作”、深化区域合作方面，还是在帮助“南方国家”、塑造“南方话语”、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方面，都站在“全球南方”一边，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

中国提出的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推动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等理念不仅改善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且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联合自强以及南北关系的改善。70 年前的万隆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被纳入“万隆十项原则”之中。1954 年中印、中缅发表的“联合声明”也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纳入其中。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不断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融入国际和平发展的潮流，推动了经济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特别是中共十八大召开后，中国继续践行和弘扬万隆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中国一直努力进口更多国外优质产品和服务，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关税总水平已降到 7.3%，连续 7 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年进口规模多年居世界第二。中国已成为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 30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23 个自贸协定，自贸伙伴遍及五大洲的“全

球南方”国家。2024年中国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还对跨境服务贸易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免签入境外国人2024年超2000万人次。这些都为世界各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积极走出去，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并积极对“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相关资料，中国已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千个成套和物资援助项目，开展了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培训了各类人员40多万人次<sup>①</sup>，有力支持了“全球南方”各国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积极发声，始终坚定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报告就将中国列为“全球南方”国家。近年来，中国发起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符合万隆精神和时代潮流，也适应了“全球南方”的需求。例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制度规则，积极推动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并积极向各国提供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设备，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又如，为了推动“全球南方”共同发展，2024年6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宣布中方将设立“全球南方”研究中心，未来5年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1000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卓越奖学金”名额、提供10万个研修培训名额，并启动“全球南方”青年领军者计划。承诺中方将继续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愿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以及进口更多产品。这些都显示中国努力让发展机遇和成果惠及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始终与“全球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即使从“全球南方”的地理、经济等内涵或属性看，中国目前还是世界最大的南方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认定的“全球南方”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不包括以色列、日本和韩国）以及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在

---

<sup>①</sup> 《中国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各类援助》，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21-10/26/content\\_77832873.html](http://news.china.com.cn/2021-10/26/content_77832873.html)。

此地理范围内。如果从经济属性看，“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概念互换使用频繁，而中国一直被认为是新兴市场或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代表。2024年初步核算中国GDP达134.9万亿元，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但由于中国人口多，人均GDP并不高，再加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时间、城乡差距较大、科教等短板突出，要实现现代化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如果从价值理念看，“全球南方”是多样化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和利益诉求的集成，“非西方化”明显，中国同样属于世界多样化的一员。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指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sup>①</sup>可见，中国未来仍将继续坚持同“全球南方”国家坚定站在一起。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快速发展和崛起，靠的是顺应时代潮流、改革开放、科技创新、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公开公平竞争和人民的辛勤劳动，不是靠保护主义和“占别人便宜”，更不是靠殖民掠夺得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激发了“全球南方”国家结合各自国情、把握自己命运、共同走向现代化的信心。2023年8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致辞时说，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都能从本国国情出发，在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探索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sup>②</sup>面对当前世界的大调整大变局，中国希望与“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合作，获得更多新机遇保障安全和促进发展，更好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sup>①</sup>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4—55页。

<sup>②</sup> 《习近平向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发表致辞》，《人民日报》，2023年8月23日，第2版。



### 三、奏响“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时代强音

2024年11月，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访华，中国与印尼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历久弥新，已成为开放包容、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双方将共同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赋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新的内涵，奏响“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时代强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sup>①</sup> 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也是特朗普执政2.0版开局之年，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将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国际力量、国际关系调整步伐也将加快，“全球南方”国家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奏响联合自强的时代强音，努力推动“全球南方”进一步崛起。

#### 1. 聚焦发展这一最大公约数

“全球南方”是推动共同发展和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力量。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人工智能、量子科技、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大量涌现，但“南北差距”、数字鸿沟、技术鸿沟突出，求发展是“全球南方”的最大公约数。我们要抓住和用好各种机遇，把发展置于各国的中心地位，加强经贸、科技、产业、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大力推动互联互通，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经济实力。要坚持科技创新，加强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让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搭上数字经济发展快车。要坚持合作谋共赢，深化农业、能源、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推广绿色产品和技术合作，拓展人工智能、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做大经济“蛋糕”，实现共同发展。要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持续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合力打造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共同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升国际话语权。

#### 2. 坚持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世界大趋势。世界越是复杂多变，越是动荡不定，越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全球南方”国家要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积极发出和平之声，走稳共谋发展之路。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树立互信、

---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关于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24年11月10日，第2版。

互利、平等、协作的理念，在维护本国安全的同时，尊重别国的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要反对强权、霸权，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构建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分歧、消除矛盾、缓解局势。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坚持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选择，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

###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人间正道，是世界面临困难挑战的“金钥匙”<sup>①</sup>。经济全球化是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路径，打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搞保护主义没有出路，也不会有赢家。但当前“美国优先”以及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地缘风险显著上升，让许多国家卷入其中，外溢效应显著，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动荡，贸易保护主义、“脱钩断链”愈演愈烈，世界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大力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确保各国在国际事务上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要坚持公平正义，加强经济合作，反对“脱钩断链”和经济胁迫，维护国际贸易有序、稳定发展，降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之间互学互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推动全球化朝着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

### 4.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世界前途命运要由各国共同掌握。“全球南方”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当前，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治理赤字明显。我们要树立“同球共济”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合力应对全球性问题，共渡难关，共创未来。加强南南合作，推动重塑全球治理关系，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挥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阿拉伯国家联盟、非洲联盟等机制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要积极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的落地生根，让发展的动

---

<sup>①</sup> 丁薛祥：《坚守多边主义正道 促进开放包容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上的特别致辞》，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501/t20250121\\_11542159.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501/t20250121_11542159.shtml)。

力源源不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我们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 5. 增强战略自主

繁荣稳定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独立和战略自主是一个国家捍卫自身利益、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础。在百年变局之下，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被忽视或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内政也常常受到强权政治的干涉。当今美国是影响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合作的最大变量。受特朗普执政2.0版带来的不确定影响，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被迫选边站，但大多数国家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全球南方”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大力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合作环境，做维护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开放包容的中坚力量、合作共赢的支撑力量。要团结一心，发挥群体优势，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积极提升实力和影响力。坚持联合自强，不蓄意挑起冲突，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坚决捍卫自身利益。坚持“不结盟”政策，保持战略自主，从自身利益出发，拒绝在大国间选边站队，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万隆精神助力全球南方行稳致远<sup>①</sup>

成振海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集合体及其新时期的演进新样态，“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一支全球性的战略力量。全球南方与万隆会议与会国紧密的历史和情感联系，使得它成为万隆精神的天然承续者。面对当前全球南方发展所遭遇的内外挑战，万隆精神仍具有重要的思想引领和道路指引意义。中国作为万隆精神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和“全球南方”的当然重要成员，有责任担当沟通两者的桥梁，主动成为万隆精神在全球南方中的传播者、实践者、发展者和引领者，进而推动“全球南方”乃至世界各国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

<sup>①</sup> 本文系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下安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潜力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3AH050131）的阶段性成果。

## 一、全球南方是万隆精神的天然历史承接者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9个国家和地区的340名代表齐聚一堂<sup>①</sup>，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首次没有殖民国家参与的、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即万隆会议。万隆会议标志着南南合作的开启，由此揭开了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篇章。<sup>②</sup>

会议期间，与会各国经过协商，成功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这份文件的内容涵盖了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世界和平和合作、人权和自决权、附属地人民问题、“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以及“其他问题”等七项广泛议题。<sup>③</sup>会议还提出了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承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不以集体防御之安排服务于任何大国的特殊利益、反对实施侵略、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等十项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史称“万隆十项原则”。尤为重要的是，万隆会议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创造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为亚非各国反殖反帝、实现民族独立提供了精神支持，也为它们展开团结合作、彼此互助提供了重要指引。

一直以来，在亚非国家的历史叙事中，万隆精神的重要价值均得到了高度肯定。首先，万隆精神激励和鼓舞了亚非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信心。在万隆会议后的十年间，亚非两大洲新独立的国家就有35个，此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非洲和其他大洲又有49个国家先后实现独立。其次，万隆精神为亚非国家独立自主地讨论和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思想引领。万隆会议明确提出，“与会国在国际会谈中要事先进行磋商，以便尽可能促使它们共同的经济利益”，这一“磋商”原则在1964年被七十七国集团所沿用和发展，成为促进南方国家团结和合作的指导性原则之一。<sup>④</sup>最后，万隆精神为第三世界的崛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

① 其中亚洲国家有23个、非洲国家6个。此外，非洲部分仍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政党、南非反种族主义政党也作为观察员列席了会议。

② 沐涛：《再论万隆会议对现代中非关系的开创意义》，《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第24页；陈菲：《万隆会议提升中国外交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月10日，[https://www.cssn.cn/skqns/skqns\\_qnzs/202407/t20240704\\_5762784.shtml](https://www.cssn.cn/skqns/skqns_qnzs/202407/t20240704_5762784.shtml)。

③ 陆庭恩：《论万隆会议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11页。

④ 耿殿忠：《南南合作的开端与典范——纪念万隆会议40周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3期，第79页。

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万隆会议对西方试图保留或重建在亚洲和非洲主从关系的做法进行了批判，为战后大国主导国际秩序注入了一股新鲜空气，有力地催生了一场在美苏冷战对抗格局下主张中立的不结盟运动<sup>①</sup>，并推动了未来七十七国集团<sup>②</sup>和其他新兴力量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呼唤。<sup>③</sup>也正因为万隆精神反映了当时和之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心声，再加上其富有哲思的思想内核所具有的广泛包容性和跨越时空的延展性，使得它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得以在发展中国家中不断传承和发扬，其内涵在之后的国际实践中也不断得到深化与丰富。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新冠肺炎感染、乌克兰危机、粮食和能源安全危机、巴以冲突以及大国霸权主义的盛行，“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等概念迅速让位于“全球南方”（The Global South）这一国际政治新热词<sup>④</sup>。在2023年9月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全球南方”议题更是受到了重点关注。那么，“全球南方”与上述概念到底具有何种关系？它与万隆精神之间又存在哪些历史和现实联系？唯有从历史源头出发，追溯“全球南方”这一概念形成的过程，才能够揭示这些问题。

“全球南方”并非最近才被创造出的词汇。1969年，美国政治作家卡尔·奥格尔斯比（Carl Oglesby）为《公益》（*Commonweal*）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越南战争的特刊。在该文中，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北方”对“全球南方的统治……已经越加产生了一种无法容忍的社会秩序”。<sup>⑤</sup>这是“全球南方”一词已知的最早出处。奥格尔斯比试图构建起一幅身份政治的图景，通过它能够直观、简便地呈现当时“南”与“北”间不平等且对立的关系，<sup>⑥</sup>而该词当时主要指代第三世界国家。

1952年，法国人口学家、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在他题为《三个世界，一个星球》（*Trois Mondes, Une*

---

① 1961年9月，由埃及、南斯拉夫、印度、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五国发起的第一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共有25个国家的首脑与会。会议通过了《不结盟运动宣言》，确立了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和宗旨，并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此次会议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兴起。

② 1964年12月，在首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期间，77个发展中国家发表了《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提出了关于国际经济关系、贸易与发展的一整套主张，标志着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

③ Andrew Phillips, “Beyond Bandung: the 1955 Asian-African Conference and its legacies for international 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0, No. 4, 2016, pp. 334-335.

④ 孙吉胜：《“全球南方”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及前景》，《当代世界》，2024年第7期，第38页。

⑤ Carl Oglesby, “Vietnamism has failed... The revolution can only be mauled, not defeated”, *Commonweal*, No. 90, 1969, pp. 11-12.

⑥ Cecilia E. Sottolotta, “‘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 EU Digital Diplomacy towards the Global South”, German Institute for Global and Area Studies, 2023, pp. 6-7.



Planète) 的文章中,首次使用“第三世界”<sup>①</sup>(Third World)一词,而万隆会议正是第三世界国家举行的早期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使亚非已经独立或者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看到了与东方或西方集团结盟之外的第三种选择,实际上揭开了不结盟运动的序幕。<sup>②</sup>1961年,第一届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提出“发展中国家”联合抵制不平等国际贸易的建议。同年,一种将世界经济分为“中心”和“外围”地区的批判模式开始盛行。“中心”随之对标为“北方”,边缘也被视同为“南方”,划分“南北国家”身份的标准也由政治、意识形态标准开始转向经济发展程度标准。1963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首次正式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概念,会上还诞生了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七十七国集团。<sup>③</sup>该组织很快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利益代表。1967年10月,七十七国集团首次部长理事会第一次使用了“最不发达国家”的概念,集中阐释了“南南合作”的原则,并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决定联合抵制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掠夺,但仍然难以扭转南北发展鸿沟持续被拉大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题为《南北:一项生存计划》(*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的报告中,根据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层次,在一份世界地图上以标线的形式,将世界一分为二。该线以北是“富裕的北方”,以南则为“落后国家”,可谓泾渭分明。<sup>④</sup>

冷战结束后,以经济发展程度作为划分世界标准的做法占据优势,意识形态和阵营属性标准则淡化明显。随着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全球”与“南方”两种概念出现了加速结合。而较之于“北方”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而言,广大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国家、“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均被纳入这一词汇范畴。

由此可见,“全球南方”并非一个正式的组织或者集团,它相对

---

<sup>①</sup> 索维指出:“在相互对抗的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再次使用了这一概念,强调自身不靠拢北约或者华约中的任一方。1974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后,该词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使用。

<sup>②</sup> B. R. Tomlinson, “What was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38, No. 2, 2003, pp. 307-309.

<sup>③</sup> 截至2024年1月,七十七国集团共有133个成员,中国虽非七十七国集团正式成员,但与该组织联系紧密。1991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会上,中国同该集团首次以“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的方式共同提出立场文件。此后通过“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这一机制,双方开展协调与合作。中国参加了七十七国集团历届外长会。

<sup>④</sup> Nicholas Lees, “The Brandt Line after Forty Years: The More North-South Relation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7, No. 1, 2021, pp. 85-86. 该线以北纬约30度为界,大致从美国和墨西哥、非洲北部和中东之间穿过,穿过中国和蒙古北部边界,然后向南延伸。

于“全球北方”或“西方”而存在，本质上是对一种结构性集体身份及其所处状态的概括。从狭义上讲，可以认为全球南方的范围相当于或等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将之视为发展中国家身份的一种延续。<sup>①</sup>它们是具有相似历史遭遇、相近的发展阶段、共同的发展目标和利益诉求的、若干国家组成的国家群体。<sup>②</sup>从广义上讲，它的范畴不但涵盖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新兴市场”等概念，而且也是对一种反霸权、追求公正、平等、和平的国际新秩序思想和倾向的描述，而其含义的具体指向随着南北关系的变化而不断演化。<sup>③</sup>

总之，全球南方国家与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组成主体是相同的，它与万隆会议的参与者有着天然的历史和现实联系。尽管从地缘政治维度看，全球南方一词出现于全球经济“南升北降”的背景下，这与20世纪50年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试图卷土重来的国际环境不同，但是面对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自身“实力地位”和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采取的霸权、霸道行径，以及这些行径给世界和平稳定造成的严重威胁，全球南方反对不平等、不公正、不安全、维护独立自主并联合自强的需求是共同的。总之，天然的历史联系和紧迫的共同需求，决定了万隆精神的历史回响必将为全球南方的发展注入新的精神动力。

## 二、全球南方面临的内外挑战呼唤万隆精神

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并受到各方重视，其所面临的内部团结挑战和外部分化掣肘日益凸显，这导致全球南方的发展前景仍然包含诸多不确定性。全球南方国家拥有共同的被侵略和殖民的历史、拥有共同的理念和追求、拥有广泛的现实利益，这些与万隆精神的实质和内涵高度一致。与此同时，万隆精神所包含的求同存异、互利合作、包容多元的历史智慧，不仅可以为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联合自强、互利合作提供思想引领，也将助益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给世界带来

---

① 张一飞：《“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基础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48页。

② 相关概念间的具体差异，参见：吴志成、王尹泽：《“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治理发展》，《国外理论动态》，2024年第4期，第111页。就地理范围而言，目前，学界对全球南方的成员范围划分不一。一些学者根据联合国2023年的划分标准，将包括“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内的157个联合国成员国界定为全球南方。部分西方学者则将“七十七国集团”或者“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界定为全球南方，并有意将中国排除在外。

③ 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外交评论》，2024年第2期，第3页。

了新的气象。

第一，万隆精神有助于全球南方共同应对外部的挑战。

首先，维护各国独立与安全，保证各国平等发展的权利是万隆精神的底色，而这也是全球南方得以生成、发展的前提与保障。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的与会者们怀着反帝、反殖民、反霸权的热情，试图改变仍盛行于世界的种族主义等级制度和帝国主义秩序。今天，尽管全球南方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地位，但殖民主义的新变体仍层出不穷，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继续威胁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长期以来，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推行干涉主义，频繁策动“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甚至不惜间接或直接动用武力，已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麻烦制造者”。据统计，仅在1947年至1989年间，美国就实施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和6次公开行动，导致多国和地区至今政治动荡、经济凋敝、民生困苦。<sup>①</sup>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还依仗其舆论霸权，强制向全球南方国家输送西方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并将自身价值观凌驾于其他所有国家与民族的观念之上，借以塑造思想，瓦解非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府权威。<sup>②</sup>因此，重拾全球南方的“万隆时刻”，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历史记忆的觉醒自强，共谋各国独立自主大计。

其次，维护各国发展权益，实现本国发展振兴是万隆精神的使命目标，而这也是全球南方的历史使命和共同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初步实现国家独立的部分亚非国家，还面临着摆脱殖民经济依赖、发展民族经济、维护自身经济主权的急迫任务。万隆会议专门通过了《经济合作》决议，其中首次提出在亚非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合作”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且确定了联合维护国际原料价格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发展中国家之后组成了各种原料生产国和输出国组织。为解决各国发展资金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经济合作》决议还提出共同“建立国家和区域银行”以及实行技术合作的建议。<sup>③</sup>目前，全球南方国家中虽然有部分成员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目标，在国际经济领域扮演着越加重要的角色，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总体上仍将之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和被“管理”的“中下层国家”。<sup>④</sup>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面对全球贸易关系

① 《美国策动“颜色革命”危害世界》，《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7月21日，第7版。

② 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2023年第23期，第18页。

③ 耿殿忠：《南南合作的开端与典范——纪念万隆会议40周年》，《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3期，第85页。

④ 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外交评论》，2024年第2期，第3页。

和贸易体系的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加速重构，全球南方经济上的相对弱势地位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这些挑战促使全球南方需要秉持万隆精神，共同反对贸易霸凌和价值剥削，推动国际经济秩序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力量上升的历史趋势。

最后，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应对国际政治环境的深刻变革，是万隆精神团结的重要表现，这也是全球南方国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共同心声。冷战格局的形成以及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构成了亚非国家摆脱超级大国胁迫或拉诱，抵制在两大阵营中选边站的又一主要国际政治环境。万隆精神满足了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希望和平、平等的愿望，为小国、弱国寻求集体安全提供了平台。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大肆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双重标准”，挑动阵营对抗和大国竞争，并直接或间接迫使第三方国家选边站队，使得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着反干涉渗透、反霸凌、反制裁、反“双标”等重要任务。在乌克兰危机和新一轮巴以冲突分别爆发后，全球南方国家没有屈服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坚持了自身客观、公正的立场。面对与全球北方之间仍然存在的较大差距，全球南方国家只有继续发扬万隆精神，充分显示出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的坚定立场，才能更好地捍卫集体的利益。

第二，万隆精神有助于化解全球南方内部的团结挑战。

作为亚非民族独立国家单独举行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参加万隆会议的亚非 29 个国家和地区本身就是多元的。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原因，各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不可能完全相同。万隆会议的与会国从广义上可分为和平中立主义国家、极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少量西方地区侵略集团成员国等三种类型，再加上帝国主义国家在会议召开前后的分化和破坏，这也就决定了万隆会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隔阂、分歧、误解，甚至矛盾。<sup>①</sup>然而，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努力排除了干扰，经过充分、平等地协商，“求同存异”，凝聚了最大共识，最终成功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成为万隆会议的标志性成果，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未来合作的方向和框架，也为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原则指导。

作为万隆精神的历史承接者，全球南方的内部组成、利益诉求和策略目标显然更为复杂。首先，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分布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大洋洲，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文

---

<sup>①</sup> 陆庭恩：《论万隆会议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10—11页。



明发展模式、现实处境等各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和差异性。<sup>①</sup>其次，全球南方缺乏统一的政治共识。全球南方并非正式的组织或者集团，也无常设的日常机构协调各方立场和利益，松散型和缺乏组织性使得全球南方在事关自身发展和重大国际问题上缺乏一致的声音和行动。再次，由于西方国家总体仍处于优势地位，再加上全球南方内部发展水平不一，导致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利益和诉求差异较大。最后，在全球南方内部，个别大国——例如印度，为一己之私和狭隘的地缘政治盘算，试图通过策略性手段，排除或者削弱中国等其他成员的影响力，借以主导或者领导全球南方的议程和方向，使全球南方内部隐藏着分化甚至分裂的潜在风险。<sup>②</sup>这需要我们学习和坚持万隆会议领导人卓越的政治智慧，摆脱不信任和恐惧，相互信任、相互宽容，树立全球南方命运与共的意识，维护好全球南方的团结。

### 三、万隆精神与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的中国角色

万隆精神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引领南南合作，至今已经走过70年的不平凡的历程，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发挥了重大历史性作用。新形势下，万隆精神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作为南南合作在新时期的新演进、新样态和新起点，“全球南方”是万隆精神当然的时代承接者。面对全球南方所遭遇的内外挑战，万隆精神的指导性意义也必将助力全球南方行稳致远。

一直以来，万隆会议都被视为新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搭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对话与交流的平台，极大改变了新中国的国际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在会议几乎陷入败局之时，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以及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文化合作的建议，成功打破了会议的僵局，为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基础。总之，中国既是万隆精神的主要贡献者和重要见证者，也始终是这份历史智慧的最忠实的珍视者和最为积极的继承者、倡导者、践行者和发展者。

201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习近

<sup>①</sup> 张一飞：《“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基础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6期，第58页。

<sup>②</sup> 戴永红、周禹朋、付乐：《中国的“全球南方”观与“全球南方”合作发展前瞻》，《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3期，第61页。



平主席发表了题为《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他表示各国应该大力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从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等三方面提出了弘扬万隆精神的三点倡议。2023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明确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的身份定位和利益诉求。2024年6月，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及万隆精神的时代价值。那么，如何使万隆精神更加深植于全球南方各国的交往中？如何强化、丰富、拓展和实践它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在这方面，作为全球南方当然成员和引领者之一的中国，自然负有重要使命。

第一，中国要在全球南方中做万隆精神的坚定传播者和倡导者，与全球南方国家一道，尊重差异，构建新时代全球南方的话语体系和思想理论体系，展现中国智慧。当前，全球南方已经并非仅仅是一个地理或者政治概念，而是已经成为一支平衡国际“系统竞争者”的重要政治力量。<sup>①</sup>然而，全球南方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全球南方观”和行动准则。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全球南方内部政治共识的缺失以及美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话语权的争夺和利用，构建什么样的全球南方观显然已经十分紧迫。一直以来，南南合作机制秉持万隆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的“金砖国家合作观”。<sup>②</sup>因此，倡导以万隆精神为基础之一的新的“全球南方观”，不但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需求，也是最具包容性、最具平等性和互惠性的合作理念。

第二，中国要在全球南方中做万隆精神的忠实实践者和推行者，展现中国担当。“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回顾历史，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始终秉持并践行着万隆精神，这为中国构建良好的国际形象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球南方发展的新时期，中国的具体举措无疑将更具示范意义。中国一方面应淡化全球南方内部的观念分歧，运用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关键大国地位和影响力，逐步提升全球南方在发展、安全、制度等领域的话语权，做全球南方坚定的成员方、支持方和建设者。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搭建全球南方合作的互利平台，并使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全球南方。长期以来，中国立足于全球南方对象国的

---

<sup>①</sup> Tobias Bunde, et al., *Re: Vision,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3*, Munic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2023, pp. 90-91.

<sup>②</sup> 戴永红、周禹朋、付乐：《中国的“全球南方”观与“全球南方”合作发展前瞻》，《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3期，第63页。

发展需求,提供自身在治国理政、党际交往、现代化发展道路、能源和数字转型、人工智能、公共卫生、农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中的中国经验,以平等、尊重、包容、坦诚的心态,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合作战略对接。中国积极建设和加强全球南方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如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积极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事业,目前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sup>①</sup>,同时设立了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全球南方”研究中心,同有关方共同设立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三方合作示范中心,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发展等等。这一系列举措展现了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和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赢得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广泛赞誉。展望未来,中国应主动并支持全球南方自主成立更多多边组织机构,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多新鲜力量。

第三,中国要在全球南方中做万隆精神的发展者和引领者。在万隆精神的基础上,挖掘其思想新内涵,中国根据新时代的新要求,始终在推进全球南方合作理念的创新。中国提出全球南方开放包容合作倡议,秉持真实亲诚和合作共赢的理念,广泛地同非洲、阿拉伯国家、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进行合作,凝聚全球南方团结进步的合力。中国秉持“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全球南方的多边主义立场,并积极推进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尽管全球南方具有鲜明的非西方、反霸权、谋发展、求正义等共性,但其目的是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和公平的世界秩序,这与美西方推行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霸权霸道霸凌、阵营对抗、贸易保护等具有鲜明利己性、排他性、侵略性的政策完全相反。在强化全球南方合作的同时,中国也要推动南北对话,推动世界走向共同和平、共同安全、共同繁荣、共同进步的光明前景。

[责任编辑:李丽]

<sup>①</sup> 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2023年第23期,第17页。